

个没有土地的民族要争夺土地的历史。再加上这个争夺土地的斗争是以上帝应许的名义对伊斯兰教徒进行的,所以争斗的双方都不会让步。尽管彻底解决中东矛盾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通过对《圣经》的细读,我们起码可以较深刻地体会犹太民族几千年来因没有土地而遭受的苦难以及他们和巴勒斯坦地区众多部族的千年恩怨,从而在国际范围内采取更合理和有效的措施来推动中东问题以和平方式获得解决。

最后要提及的是《圣经》文学研究在外国文学教学和人才培养方面所起的作用。到目前为止,在国际范围内把《圣经》当作文学经典来研究和阐释的这个领域里吸引了众多出色的文学教授、叙事学和文体学专家、文学和文化研究的理论家,还有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心理学等学者。他们发表的《圣经》文学阐释成果都十分前沿,观点新颖,学识渊博,见解独到。当然他们的成就首先来自他们各自的学养,然而《圣经》这样一个比所有其他文学经典都博大、深邃的文本也为他们施展才华提供了最佳的演练机会。正因为《圣经》的阐释潜力十分巨大,又有这么多优秀的理论家和学者已经或正在对它进行多方位的探讨,所以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在我国外国文学的教学和研究中开设和发展《圣经》的文学研究和阐释既是为了研究《圣经》的文学品质和超越宗教范围的丰富内涵,又是使用各种文论对学生和研究工作者进行文学批评的上好训练。通过对《圣经》进行文学和文化解读,我们肯定会更深入、更好地学到国际前沿的文学解读方法和技巧,打开眼界,并改变我们的思维模式,培养出更多与国际接轨的外国文学研究人才。

综上所述,《圣经》的文学研究在当代的确意义

重大。它提供了一个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领域,集文学、文化、语言、文体、叙事,以及历史、社会、哲学、政治与意识形态研究于一炉。因此,除去可以挽救西方文学经典及加深对世界政治和纷争的认识之外,这一研究方向还可以作为教学的手段,为培养文学研究人才做出贡献,真可以说是一石数鸟。据此,我们应该继续加大力度发展《圣经》研究,特别是《圣经》的文学研究,以使我国更快地从多个方位融入国际大家庭,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中获得主动和更多发言权,知己知彼地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

参考文献:

- [1] Northrop Frg. *The Great Code: The Bible and Literature* [M]. New York and London: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Publishers, 1990.
- [2] Susan Handelman. *The Slayers of Moses: The emergence of Rabbinic Interpretation in Modern Literary Theory* Albany [M].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2.
- [3] 杰弗里. 东行游记与西行游记: 主干情节对比研究 [M]//当代欧洲文学纵横谈.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2.
- [4] Meir Sternberg. *The Poetics of Biblical Narrative: Ideological Literature and the Drama of Reading* [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5.
- [5] 杰弗里. 《圣经》与美国神话[J]. 基督教文化学刊, 2001, (5).

作者简介: 刘意青(1941—), 女, 江苏南京人,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全国高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副会长, 现挂职任教于新疆石河子大学外国语学院。

圣经文学研究意义之所在

梁 工

(河南大学 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 河南 开封 475001)

目前, 圣经文学研究正在深入发展, 它覆盖了文学研究和圣经研究两个领域。文学研究方法日益引起圣经学者的注意, 致使圣经学术发生了向文学研究范式的转移。对于文学批评家而言, 圣经被认可为经典的构成部分, 其卷籍由文学研究者在课堂上讲授, 并成为他们发表批评文章及学术著作的研讨对象。

一、圣经文学研究对于理解圣经特质的重要性

《圣经》不仅是宗教神学典籍, 也是重要的文学经典。早在《圣经》著述和编订之日, 其作者就有明确的文学意识, 使之具备了显著的文学特质。这部文集陆续形成于距今大约两千年前的古代, 用远离现代文明的冷僻文字——古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写

成,其文学运作、语法修辞的潜在规则为现代读者所难以驾驭。^[1] Introduction, 5 形象和思辨、情感和理智、隐喻和直白、含混和明晰……纵横交错地纠缠在一起,其间涉及多种文类体裁、结构样式、表达方式、修辞技巧、叙述视角、抒情韵律、风格语气和寓意象征,它们彼此制约又交相辉映,共同营造出意义的家园和观念的世界。倘若离开文学批评的途径,欲真正走进这个家园,融入这个世界,观其万千气象而领会个中的堂奥,必定很难遂心如意。即如罗伯特·奥特(Robert Alter)所说,《圣经》是一部用语言文字写成的书,是通过文学手段获得表意效果的,这使得“文学解析必须先行”,惟其如此“才可能理解该书其他方面的诸多价值”。^[1] Introduction, 2 事实上,研究者试图把握圣经文学品质的活动亦始于遥远的古代,历经中世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浪漫主义时期而延续到现代和后现代。依哈罗德·布鲁姆之见,构成希伯来《圣经》的早期文献之一“J书”在西方文学经典中占据了仅次于莎士比亚戏剧的显要位置。^[2]

二、圣经文学研究对于探索世界文学规律的重要性

析言之,“圣经文学研究”涵盖了相互关联的两类学术课题:其一,研究“作为文学的《圣经》”(The Bible as Literature);其二,研究“《圣经》与文学”(The Bible and Literature)的关系。就后一类课题而言,19世纪上半叶,一批法国学者以跨民族、跨语言的目光观察文学,运用考据和实证的方法研究文学的渊源和影响,为日后形成的比较文学法国学派赢得最初的成就,而他们十分关注的一类课题,就是莎士比亚、但丁等诗人、作家与《圣经》的关系。此外,研究者津津乐道的对象尚可举出弥尔顿、约翰·班扬、歌德、雪莱、拜伦、雨果、狄更斯、哈代、劳伦斯、萧伯纳、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T. S. 艾略特、福克纳、奥尼尔、布尔加科夫等。这方面的研究表明,《圣经》乃是西方文学成长的重要源泉,滋养了后代几乎所有名家名著。谢大卫主编的《英语文学中的圣经传统辞典》^[3]和勒兰德·莱肯等主编的《圣经意象辞典》^[4]便以宏大的篇幅和浩繁的条目展示出《圣经》养育西方文学成长的生动图景,表明“在不少方面,《圣经》对于文学研究的重要性已超越对《圣经》本身的文学分析。《圣经》之所以能持续不断地进入学术性的文学课堂,原因之一在于它是西方文学最伟大的源头,对文学的象征意义产生了重大影响。”^[5]^[12]如今学术界已有共识,要想全面深入地认识世界文学的规律,绝不能忽视对圣经文学的研究,

不能忽视对世界文学中的圣经元素的剖析。

三、圣经研究对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借鉴意义

马克思论及“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时提到“早熟的儿童”。^[6]^[114]“早熟的儿童”所指为何人?据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希·萨·柏拉威尔揣测,马克思“心目中想到的可能就是犹太人”。^[7]^[388]柏拉威尔引以为据的是海涅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之前发表的一段述评:“关于犹太人……也许我在谈论他们时从来没有怀过适当的敬意……因为我那种崇拜希腊精神的性格对犹太人的苦行非常反感。现在我认识到希腊人只不过是年轻人,而犹太人却是成年人,是强有力的,不易折服的成年人——不仅在古代如此,就是到了今天,在经过一千八百年的迫害和痛苦后,依然如此。”^[7]^[388]海涅的见解不无道理。“犹太人的苦行”乃是从他们的宗教意识中衍生出来的。他们很早就形成对本民族之神耶和华的崇拜,当古代世界还普遍奉拜多神时,他们就发展出独拜一神的宗教意识形态,这无疑是其早熟的表现。海涅认为“一千八百年的迫害和痛苦”使犹太人成为“强有力的、不易折服的成年人”,更有无数的历史事实为佐证。犹太人经常遭受外族入侵,每每成为异族统治者奴役的对象,罗马帝国统治时期尤甚;时至中世纪和近现代他们更屡遭排挤,至希特勒迫害时期竟几遭灭族之灾。这种不幸际遇也使犹太人形成早熟的性格。再从经济发展来看,犹太人长年漂泊四海,缺乏发展实业必须依赖的土地,这使他们很早就致力于发展商贸,从事航海活动,每到一处都以做生意为基本生活方式,此一过程同样使他们过早地成熟起来。苦难使犹太民族早熟,早熟使之远在圣经时代就形成一系列历久弥新的深刻理念,比如平等、法制、民主、和谐、博爱、崇智、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世界主义等,它们对于后世精神文明建设有着持久的借鉴意义。

关于平等,《圣经》记叙了一个由上帝和世人构成的二元世界,在至高的上帝面前,从国王贵族到庶民百姓的世间万众一律平等,任何人都无权凌驾于他人之上称王称霸作威作福。名王大卫谋害手下武士乌利亚、霸占其妻拔示巴,上帝借先知拿单斥责他,使他与拔示巴所生之子数日夭亡,以示惩罚。关于法制,希伯来《圣经》的第一部分“律法书”贯注着一个基本精神:立法是神圣的,法律的尊严来自上帝;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执法必须严肃;在唯一的立法者上帝面前,人人皆受法律的约束;凡声称追随上帝者,皆须不折不扣地履行他制定的法律。民族

主义和爱国主义是犹太人的立族之本和兴教之纲。圣经作者都是热忱的爱国志士,他们坚定地维护本民族利益,热烈颂扬抗敌卫国的民族英雄,对四邻敌族示以不共戴天的仇恨。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相映生辉,《圣经》中也有丰富的世界主义或国际主义思想。一些先知主张“普世皆为上帝民”,彼此之间互为兄弟。《约拿书》中的上帝被塑造成博爱众生(包括以色列之敌)的仁慈天父,《路得记》赞成不同民族间彼此联姻,反对禁止联姻的狭隘民族主义。初期基督教更明确主张以世界主义路线为指针,征服西方霸罗马帝国,将福音传遍全世界。

《圣经》中弥漫着浓厚的民主意识。亚里士多德认为,所谓民主政体,是指“政事裁决于大多数人的意志,大多数人的意志就是正义。所谓‘平等’是说全体公民人人相等。因此在民主政体中,穷人属于多数而多数决定一切,他们就拥有较高于富室的权力”。^[8] 387 可见“民主”意味着全体公民在政治上普遍平等,大多数人的意志能得到充分实现。以色列古代社会虽未形成希腊雅典式的民主政体,《圣经》中却始终流淌着民主观念的潜流,“民众意志”表面上淡化于历史活动的幕后,实则在一系列重要时刻发挥着重大作用。例如,摩西只是在行施神迹赢得了百姓的信任之后,才被拥戴为领袖。进入旷野后百姓一次次“硬着颈项”地“发怨言”,吁求改善生存条件,其吁求皆被上帝采纳,授意摩西一一解决,这使人感到出埃及本是以色列民众的事业,上帝和摩西不过为其成功实现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保障。《箴言》31:4—8 规定,君王的本分是秉公行义,为贫穷困苦的百姓谋利益。据《列王纪上》4:25 载,所罗门在位时广得民心,是因为他使民众得以安居乐业:“从但到别是巴的犹太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圣经》的民主意识还通过先知们的活动表现出来,先知实际上处于“不断监视王权是否遵守上帝之约即律法的‘监察官’位置”,^[9] 101 一旦发现君王违法背约,他们就以弹劾者姿态出现,对其予以无情抨击。先知书是《圣经》中最富民主主义色彩的卷籍,其作者深切同情灾难深重的下层民众,无情揭露荒淫暴虐的统治者、无恶不作的官吏、贪得无厌的奸商、伪善的祭司和假先知,猛烈抨击腐败堕落的社会风习,给后世留下富含民主精神的激扬文字。《弥迦书》3:2 斥责当权者“恶善好恶,从人身上剥皮,从人骨头上剔肉”,即便今天读来也令人不寒而栗。

沉淀于《圣经》中的文明精华还表现为对一个美满和谐社会的憧憬和描绘。犹太人常年处于国破家

亡、颠沛流离的悲惨境遇中,随时需要理想主义的支撑和策励。《圣经》中不乏这类幻想光明前程的诗文,以美丽的想象给挣扎于现世苦难中的同胞带来希望、信心和力量。《以赛亚书》65:25 预言将有“新天新地”降临,那时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待,再也看不到战争和杀戮,就连猛兽毒蛇也会改变其凶残的本性:“豺狼必与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像牛一样,尘土必作蛇的食物。”与理想世界相映生辉的是一种理想化的人际关系,即张扬博爱的伦理道德。希伯来《圣经》主张在犹太民族内部实行普遍的爱,耶稣进而倡导无条件地爱一切人,甚至自己的敌人。他在十字架上受难而死,成为博爱人格和献身人格的最高典范。此外圣经文化遗产中尚有崇智精神。犹太民族自古推崇智慧,尊重智者,勇于探索未知世界,“引导学习者走向一种内在的、更高的善,那善即是智慧,那种智慧是持久的,能够改变人的生命,并赋予人以至高的尊严”。^[10]

最后,《圣经》蕴含的文化观念之所以能成为文明发展的持久推动力,是因为它从一个特定层面为人的终极关注找到一种便捷有效的运作模式。人普遍关注的终极存在者——用神学话语表述即“神”或“上帝”——在信徒那里是超自然的崇拜对象,在非信徒那里其实是各种正面理念(如真、善、美、仁慈、正义等)的终极聚合体。就此而言可以认为,虔信上帝所体现的宗教情怀事实上意味着对于至善人生和完美世界的执著追寻。

参考文献:

- [1] Robert Alter & Frank Kermode ed. *The Literary Guide to the Bible* [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 [2] 梁工. 仅次于莎士比亚戏剧的文学经典:哈罗德·布鲁姆论J书[J]. 外国文学评论, 2008, (4).
- [3] David L. Jeffery ed. *A Dictionary of Biblical Tradition in English Literature* [M]. Wm. B. Eedmans Publishing Co, 1992.
- [4] Leland Ryken, James C. Wilhoit, *Temper Longman III ed. Dictionary of Biblical Imagery* [M]. Grand Rapids, Michigan: Baker Book House, 1998.
- [5] Leland Ryken and Tremper Longman III ed. *A Complete Literary Guide to the Bible* [M]. Grand Rapids, Michigan: Baker Book House, 1992.
- [6]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 [7] 希·萨·柏拉威尔. 马克思和世界文学[M]. 梅绍武, 等, 译. 北京:三联书店, 1982.
- [8] 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M]. 吴寿彭, 译. 北京:商务印书

馆, 1997.

[9] 山本七平. 圣经常识[M]. 天津编译中心, 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2.

[10] 谢大卫. 圣经与人文学科[M]. 李毅, 译. 圣经文学研究: 第3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作者简介: 梁工(1952—), 男, 河南开封人, 河南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圣经文学研究所教授, 博士生导师。

科学发展观与圣经文学研究的当前意义

张思齐

(武汉大学文学院, 湖北 武昌 430072)

我们中国学者研究圣经文学乃是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进行的一项伟大事业。在中国, 圣经文学研究是否能够取得成绩, 其关键的一环就是研究者们能否与他们所处时代的基本精神相兼容。由于圣经文学是整个基督教研究的组成部分, 研究圣经文学必须与基督教研究的总体态势保持基本一致。自改革开放 30 年来, 中国的基督教研究, 据我个人的体会, 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一段时期, 当时主要的工作是拨乱反正, 而基督教学者们的成绩主要是恢复研究, 即把中断多年的研究工作重新拾起来。这一阶段的成果产生得较多较快, 但是深度不够。第二个阶段是江泽民同志主持党中央工作期间。1990 年 12 月 7 日江泽民同志在《一定要做好宗教工作》的讲话中语重心长地说: “宗教工作如果做得好, 可以对促进社会主义建设起好作用; 如果做得不好, 就会被国内外敌对势力所利用。”^[1] 他的讲话并非仅仅针对基督教而言, 而是包括中国的所有宗教在内, 但是因为基督教研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联系较多, 也就受益良多, 发展也最突出。主要成绩是翻译介绍了大量西方宗教学学术著作。由于有了新的养分, 中国学者撰写的论著在理论上也有了很大提高, 出现了与国际学界接轨的可喜势头。第三阶段是我们现在正经历着的时期, 由胡锦涛同志主持中央的全面工作, 核心标志是胡锦涛同志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我个人的体会是: 科学发展观是当前中国一切事业的指导方针, 也完全适用于基督教研究, 科学发展观是我们进行圣经文学研究的指导原则, 甚至可以说是内在的一种动力。不难预料,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 中国的基督教事业、基督教研究和圣经文学研究, 一定会取得宏伟的成绩。

河南大学长期饮誉学界, 《河南大学学报》具有远见卓识, 其编辑通过梁工教授约请我谈谈圣经文

学研究的当前意义。兹发表以下四点认识。

第一, 圣经文学研究有助于政局的安定与反邪教的斗争。

我们可爱的祖国是一个大国, 在历史上曾经数度作为强国而骄傲, 她的人民曾经无比自豪, 比如汉代和唐代的 中国就是如此。经过改革开放 30 年来 的发展, 中国较之过去的的确是富裕一些了, 也强大一些了。当前我们的祖国正处在一个十分关键的时期, 把握好了这个时期, 就会获得巨大的发展, 跃入世界强国之林; 失去了这次机遇, 就将长期蹭蹬, 陷入恶性循环。然而邪教不让人民过上渐趋丰裕的生活, 总是企图作乱, 危害国家安全, 干扰社会的正常秩序。十多年前就有个名噪一时的邪教作祟。直到今天, 那个邪教也还没有完全消失, 其行径其勾当邪门邪乎的, 令人不快。1999 年初夏我应厦门大学詹石窗先生之特别邀请, 在武夷山出席了全国道教学术研究会议, 当时代表们热烈讨论过如何与邪教进行斗争的问题。与邪教进行斗争乃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中国历史上就有过邪教问题, 往往搞得历代统治者头疼。所谓邪教, 就是旁门左道, 是一些不正当的宗教派别。《敦煌变文集·维摩诘经讲经文》: “然后示其正法常王, 遂讽人陈以直言, 无施邪教命。”从世界历史上看, 西方各国也有邪教问题, 其危害甚至跨越国界, 危害数国。一般说来, 邪教往往出现在社会转型时期, 因为这时人们原有的价值观需要调整, 而新的价值观尚未完全形成, 邪教就会乘虚而入。清代学者俞蛟《梦厂杂著·临清寇略》: “时逆匪王伦, 以清水邪教煽聚亡命至数千人, 阴布其党于东昌、兖州二郡。”近人陈夔龙(1857—1948)《梦蕉亭杂记》卷一: “会京师大旱, 谣言蜂起, 谓某县某村镇邪教起事, 勾结山东、河南教匪, 克期入京。”邪教之所以坏, 是因为它们有一个共同点, 即为其头目们谋私利, 敛钱财。